

第四章

日本对伪满的所谓“承认”

满铁与关东军共同行动

自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到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不到5个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到伪满洲国出笼也只有近半年的时间。事态演变之所以如此之快，应该从敌我双方寻找原因。

从日本方面的侵略兵力来看，事变当时关东军拥有的兵力是：第二师团，下辖第三、第十五两个旅团，即长谷部旅团和天野旅团，两个旅团所辖4个步兵联队分驻旅顺、辽阳、奉天、长春，所辖山炮、野炮各1个联队分驻奉天、海城；独立守备队，下辖6个大队，分驻于南满铁铁路（包括安奉铁路）沿线。总共1万余人。事变爆发当时，除驻朝日军“越境将军”林銑十郎由其第二十师团抽组第三十九混成旅团，越境加入关东军的序列外，并无其他增援部队。11月中旬关东军进攻昂昂溪和齐齐哈尔时，才有原属第八师团的第四混成旅团侵入东北。1931年末至1932年初关东军进攻锦州时，日军部队增加较多：原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司令部；原属第十九师团驻朝鲜罗南的第三十八混成旅团；原属第十师团的第八混成旅团。对于当时只拥有17个常备师团的日本来说，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侵略别国，不能说没有倾注力量。

但是，同东三省当时拥有的中国兵力相比，显然是相差悬殊，事变初期尤其如此。事变前的东北军有国防军与省防军之别。前者隶属于东北边防总司令部，后者受各省区处，分别设有镇守使。此外，蒙旗各王公还拥有卫队。各省兵力情况是：辽宁省，国防军步兵13个旅、骑兵3个旅，省防军2个旅，屯垦军1个旅；吉林省，国防军步兵8个旅、骑兵1个旅，省防军5个旅；黑龙江省，国防军步兵2个旅、骑兵1个旅，省防军步兵8个旅、骑兵1个旅。辽吉两省还都驻有属于国防军的独立炮兵团。空军也已建立并拥有相当规模。总之，拥有40个旅左右的东北军号称40万大军是符合实际的。诚然，事变前东北军的相当一部分由张学良、万福麟率领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和平息石友三叛乱，但是留在东北的部队仍有25万人以上，即10倍于关东军，这是公认的事实。^①

关东军为了达到“以少胜多”采取了突然袭击和集中兵力于一点的战术。但是，关东军实现对东三省的快速占领，既不能归“功”于它的战术，也不是全凭其自身之力。如果没有像满铁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侵略势力的参与、配合和支持，关东军是难以逞其凶的。曾任满铁总裁和外交大臣的松冈洋右供称：“发动满

^① 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编《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169~170页载：1930年张学良率7万兵力入关，当时东北军的兵力为26万人，加上非正规军共36万人。而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载：当时东北军有正规军26.8万人，非正规军13万人；辽黑两省入关兵力为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炮兵8个团，共11.5万人。关于入关东北军番号，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载：第一军为步五、二十三、二十七旅和骑六旅等；第二军为步二、四、二十五旅和骑一、五旅等。而关东军的调查则为：第一军，独十、十一、十三、十四、十八旅，独炮六旅，新骑一师，独炮七旅；第二军，独八、十五旅，独骑四、五旅，新六旅等。1931年6月1日起东北军改为全国统一的新番号。

洲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①

1931年的满铁已拥有4.4亿元资本，1100公里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近40000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事变爆发后，满铁这个“国中之国”不但为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别动力量，而且举全力充当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首先是军运。前面已经说过，在关东军爆炸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并开始向北大营进攻的9月18日晚10时20分，关东军的佐伯文郎中佐同时进入大连的满铁铁道部长室，宣布关东军、满铁联合临时线区司令部成立，立即由铁道作战监部组织大规模军运。据统计：奉天方向，9月19日1时10分至当日18时26分，编发了13次列车，20日又编发了4次列车；长春方向，19日编发5次列车，20日编发3次列车。^②这就为关东军赢得了推行其战术所必需的部队调动的高度机动性，否则所谓“集中兵力于一点”纯属空谈。事变期间，满铁除使用自己的所谓“社线”外，还强行使用包括中国自资和中外合资的东北全部铁路，进行空前大规模的紧急军运。据满铁统计，1931年9月到1932年3月共编发军运列车4056次，亦即平均每小时有1列军车编成并投入运行。^③这还不包括军用装甲列车。满铁向“社外线”派遣的军运人员，1931年为144758人次，1932年达328918人次。^④无怪乎关东军司令官调离时，在给满铁的感谢状中特别强调：“关东军的神速行动，可以说是以帝国实力为背景的满铁的俨然存在之所赐”。^⑤

① 松冈洋右：《兴亚的大业》，1941年。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WT，7，LMT21，第65～67页。

② 满铁铁道部：《满洲事变记录》，第二卷，第13～18页。

③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79页。

④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67～68页。

⑤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1～2页。

满铁的行动当然不仅限于军运。早已做好准备的满铁本社，柳条湖的爆炸声一响立刻下达了《非常动员令》，从各个部门骤然冒出了数十个担当各种军事侵略任务的专门机构。当时作为举世无双的超级托拉斯的满铁，光是直营部门取得社员资格的职工即近40000人，其中因参加事变而“立功”者即达22254人，占社员总数的近60%，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按日本陆军部门规定，这些“立功”者均按现役军人办理：将官29人，佐官220人，尉官631人，下士官4547人，士兵10457人。^①这还不包括直接间接被利用于事变的“非社员”和满铁50多个关系会社的职工。所以，当我们研究事变过程中中日军力对比时，日军方面不能抛开满铁这支不着军装但与关东军“形影相随”的日本侵略军，它在武装侵略的诸多方面起着关东军无法起到的作用。

关东军公然武装占领我国东北，是在它业已多年非法侵驻我国东北腹地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东军司令部原来设在旅顺，关东州是关东军的后方根据地；关东军所属的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分驻在从旅顺到长春和从沈阳到安东的南满铁路沿线，因而铁路附属地则成了关东军的前进基地。铁路附属地类似租界，是满铁在铁路沿线攫取大片土地建立的，它在那里排斥中国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扎军警，扶植日本各种侵略势力。事变当时，在满铁的1100公里的铁路沿线，铁路附属地总面积已达480平方公里，并深入到我国东北最发达的中心地区。事实证明，正是这块非同一般的铁路附属地，事变前被当作关东军磨刀霍霍和右翼势力鼓惑煽动的地盘；事变后又成了关东军伙同满铁四出活动，八方出击，侵略掠夺，逞凶屠杀的后方。事变时关东军司令部就设在

^①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535页。

奉天东拓会社的大楼内，奉天附属地则成了事变的老巢。对于关东军来说，事变初期驻朝日军一个混成旅团越境前来固然是有力的支援，与此同时，居住在铁路附属地内的20万日本侨民全部武装化的增援作用亦不能低估。日本的预备役军人称作“在乡军人”，他们有严密组织：支部、联合会、分会；并由分会组成自警团、义勇团，统由设在关东军司令部内的联合支部指挥。事变前他们即蠢蠢欲动，事变后1931年11月统一改为自警团，人数以万计，直接而全面地参加武装侵略行动。全面武装化的还有附属地内的各级各日本学校学生。光是因行动有力而受到关东军表彰的就有：奉天中学校、奉天青年训练所、长春商业学校、抚顺中学校、抚顺工业实习所等。其中如长春商业学校四、五年级学生，事变爆发时正在野外教练，宿营于日军部队，9月19日凌晨接到命令“立即武装起来”，“分别走上岗位，援助军事行动。”^①满铁附属地还是关东军和日本浪人招降纳叛拼凑伪军的主要场所。诸如曲和田劲等人所组建的以日本人为主体的号称“红袖头”的靖安游击队（后改称靖安军），和伊达顺之助（亦称张宗援）、李寿山等所啸聚的伪匪军，自事变之始就是关东军的得力帮凶。

满铁在附属地外设有所谓公所，它很类似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负有特殊使命，事变时都成了军事侵略和政治阴谋的据点。例如郑家屯满铁公所，事变后那里成了公所长、“蒙古通”菊竹实藏勾结蒙匪头子巴布扎布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等人拼凑“内蒙独立军”，进行武装叛乱活动的阴谋中心。随同关东军各部队出击的一股又一股从事特殊活动的追进队，也几乎全都是满铁派出的。满铁还包办了关东军政治工作机构。前面

^① 满铁：《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第351～354页。

曾经述及，继承关东军第三课衣钵的关东军统治部，后称特务部，成员大部分来自满铁，不但部长驹井德三是满铁出身，而且次长武部治右卫门系满铁地方部长，行政课长松木侠、财政课长五十岚保司等也都是满铁人员。由老牌汉奸于冲汉出任部长的在扩大武装占领和拼凑政权等阴谋活动中起独特作用的伪自治指导部，实权完全操纵在金井章次（满铁卫生课长）、中西敏宪（满铁文书课长）、笠木良明（满铁地方部庶务课人事股主任）等一伙满铁社员手中，成员更几乎清一色是事变前后极为猖狂的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分子。伪满洲国成立后，伪自治指导部所派出的数以百计日本人自治指导员，摇身一变而为各县的土皇帝——县旗参事官。据统计，1931年9月到1933年8月末，满铁派到关东军各部、伪满各种伪组织和各铁路交通机构的社员达2600人。^①完全转为伪满政府官吏者达244人。^②前章谈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出笼当时被任命实际控制伪满政府中央各要害部门的以驹井德三为首的14名伪满日本人高级官吏中，满铁出身者占50%。

日本侵略者得以迅速占领东三省，与关东军同中央军部、军部同政府之间的政见较快统一有直接关系。在这方面，满铁特别是它的头头满铁总裁起了重要作用。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样是事变前夕才出任满铁总裁的。^③与日本军内著名“中国通”本庄繁相比，内田更是资深的日本政界外交元老，曾数次出任外相，并代理过总理大臣，还参加过日俄战后同中国的善后交涉。在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刻，他和本庄的任职，都格外引人注目。一般认为，内田奉行的将是一条与军部对立的路线，即所谓币

①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295～297页。

②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538页。

③ 内田是1931年6月到职，本庄是8月离任的。

愿外交。殊不知，恰恰就是这位币原外交的执行者，在他的领导下，不但满铁举全力协同关东军，而且他本人在推动日本对“满蒙”的军事侵略上，也扮演了非同凡响的关键性角色。事变前夕，内田也和本庄一样曾到东北各地视察。事变爆发后，他把海军中将出身的满铁理事伍堂卓雄派到奉天的关东军司令部。伍堂忠实地把内田的“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局面不再扩大”的意旨面告本庄。本庄的回答是：“拟趁此机会让他们正确认识一下我军的实力。”^①这是1931年9月20日的事情。然而时隔两周情况就发生了180度的巨大变化。10月6日下午2时，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内，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偕同副总裁江口定条与关东军司令官及其幕僚们，实现了对事变进程影响深远的重要会晤。关东军精心筹备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有两条：一是让满铁赶紧趁事变之机全面夺取利权；二是通过内田取得日本国内军政决策层对事变的全力支持。尤其后者是当务之急。就在内田与本庄会晤的5天前——1931年9月30日，国联基于中国方面的控告，第一次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撤军的强硬决议。很可能这正是关东军急忙筹备同内田会晤的真正背景。所以，本庄在他的幕僚们预先拟定的《向内田满铁总裁提出的会谈事项要点》中对内田非常恳切地称“此次事变的结局，从我国目前的大局来看，最后还是要仰赖阁下的帮助，深望阁下能垂察区区之意，在进京之后能与政府要人充分交换意见，大力支援为盼。”^②而内田不但表示了“一定效力到底的决心”，而且还提出了“必须举国一致处理”

① 1931年9月21日内田满铁总裁致币原外交大臣密电，第13106号。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UD 2，第441~442页。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じ书房，第201页。

事变的主张。^①另有史料说，本庄和内田当时还具体地谈到了建立所谓“新国家”的问题，这从下面的情节看大致是属实的。内田和江口当时是由大连专程赴奉的，会晤后带着本庄的委托径往东京，途经汉城时，10月10日拜访了日本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交换有关满洲事变的意见，结果对建立新政权及以其为对象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完全达成一致。”^②内田、江口到达日本时，适逢驹井德三刚被任命为关东军的政治经济最高顾问，按照南次郎的建议，驹井推迟三天赴任，与内田、江口密谈。内田、江口与日本国内军政要员会谈活动长达一个月，当时正是日本统治集团调整政策的关键时刻，还发生了对军部与政府结合发生很大影响的十月事件。当然，内田、江口回国活动的实际作用和效应如何，难以估价，但是，可以看到，从他们由日本回到东北的11月下旬起，再也看不出日本统治阶层在事变问题的任何分歧，而且大规模增援关东军的行动也已开始。

蒋、张的不抵抗政策

就中国方面而言，东三省迅速沦丧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力量对比悬殊，莫如说是政策错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武装侵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推行不抵抗政策，而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又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这种政策，为虎添翼，助纣为虐，确实起了帮助敌人、削弱自己的罪恶作用。

1931年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兵祸天灾，接踵而至。是年7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じ书房，第204页。

^② 《宇垣一成日记》，1931年10月10日。

月，西北军阀石友三受粤系和日本的策动在河南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刚刚平息，又发生了蔓延10余省，灾民5000万的大水灾。凡此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政策都不无影响。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出自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论。1931年2月，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总司令于一身的蒋介石，因所谓约法问题^①，软禁了国民党元老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从而导致宁粤分裂，粤系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和蒋介石遭受弹劾以致一度下野^②。与此同时，蒋介石由于对江西苏区两次围剿均遭失败，自1931年7月1日又亲自率3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所以，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通电称：“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粤逆”，“则不能攘外”。^③同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讲话中又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而当时不仅“九一八”事变早已爆发，而且齐齐哈尔已经陷落，就连辽西都岌岌可危了。

继承张作霖而身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张学良，既切身体知日本侵略者的勃勃野心，也对日趋膨胀的日本帝国主义看得过于强大。1928年，他不顾日本的阻挠，毅然实行“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谋求全国合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已成为他贯彻始终的一贯思想。1931年4月张学良进而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自同年5月28日因身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

①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剥夺反蒋派的借口，实行蒋的独裁统治。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但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于约法的争吵日烈。蒋派人劝胡“休养”未遂后，乃于1931年2月18日将胡诱捕，软禁于南京郊区汤山，声称胡“引咎辞职”，并改选了立法院长。

② 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

③ 《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医院。7月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发生后，他虽十分焦虑，但仍认为东北军无力与日本单独作战。故于1931年7月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可他同时又代表东北集团建议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①而当时正醉心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虽集会讨论了张的建议，但却否定了张的建议，并且，如上所述，7月23日在通电中还抛出了“攘外应先安内”论。自“易帜”后耿耿忠心于蒋介石的张学良，不但遵从蒋的意旨，而且为平息石友三叛乱，又从东北调精兵6万人关，并未做防卫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然而，关东军接着又借中村大尉事件大做文章，策划趁石友三叛乱之机在东北起事动武。对此，亟思回师御敌的张学良又接连向蒋介石请命，明确提出：“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指出：“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建议：“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②可是，蒋介石除重弹“剿共”的老调外毫无反应，并且于1931年8月16日发出了众所周知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③当然，精于特务和谋略活动的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了如指掌的。又何况像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这种人，于1931年8月16日去大连向满铁寻风摸底时，已经向日方泄露了中国的底数：如果日军“强制进行，只有抱不抵抗主

① 《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版，第一册，第425页。

②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

③ 据原张学良机要秘书田雨时在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9月号发表文章称，“铣电”“一直藏诸秘档，当时在新闻检查制度下，凡报章刊载‘铣电’是被删去或开天窗的。”

义。”^①所以，关东军于1931年9月中旬动武，虽因石友三叛乱很快被平息而未得利用有利条件，但也是在东北军政首脑不在，东北后方空虚，特别是确知中国将不进行抵抗的有利时机发动的。

张学良除把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看得过于强大，心存惧日而一味争取全国一致对敌外，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形势的必然发展也估计不足，存有侥幸心理。用张学良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没有把情形看明白”。^②所以，张学良与蒋介石所抱宗旨虽然不同，但在对事变的处理上，殊途同归，没有分歧。“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张学良正在前门的一家戏院看京剧。当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的十万火急的请示电报到达后，张学良下令：“不抵抗”，“避免冲突”。一般都认为，张如此下达命令是基于蒋介石的指示，可迄未见公布蒋的命令。关于这段时间的蒋、张关系，学者认为“蒋张合作无间，直至是年12月15日蒋宣布下野为止。”^③那么，蒋张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什么呢？是不抵抗，依靠国联公决，把诉诸国联作为迫使日军撤兵的唯一手段。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发自北平的《通告日军侵占沈阳电》中即称：“日兵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④同日上午，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沈阳事变时又说：“实告君，

① 1931年8月17日满铁木村理事致外务省亚洲局长电。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UD2，第159~168页。

② 1990年6月17日，8月4、5、6日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55页。

③ 吴天威：《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42页。

④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81页。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①当日下午对外报记者甚至还说：“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②应该说，张学良的这些话有些言过其实了。他下达不抵抗命令属实，现地官员也执行了他的命令，但是，不顾这种命令而自发、自动、自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激烈战斗到处发生，北大营如此，长春南岭兵营和宽城子兵营也无不如此。张学良刻意强调不抵抗和未抵抗，甚至将“枪械子弹存入库房”里，无非表示“中国方面并无意为交战团体，中国只求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③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狂人是根本无视公理的。如所周知，中国方面向国联提出控告后，1931年9月30日国联第一次做出决议，要求日军立刻撤回铁路沿线地区以内。对此，日方虽不无顾忌，但在行动上毫未收敛，10月8日又公然大规模轰炸锦州，致使国联在美国参加下于10月20日又做出第二次限期三周要求日军撤兵的决议。然而，国联此时所强调的是所谓“非战条约”，要求中日双方和平解决“争端”，抹煞了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可是，张学良却欣然地认为和平在即，日本快要撤军了。请看1931年10月20日他给张景惠等人的电报，这是他得悉国联的上述“重要消息”后立刻拍发的：“自美加入国联后，对我空气甚佳”，“国联对中、日事急欲了结”，“最近国联提议，鲜〔限〕日军于三星期内撤尽，二星期后中、日双方开始商议接收办法。至实行接收时，由中立国人员到场监视，俟日军大部分撤退时，开始正式谈判。”^④然而，日军不仅未退，反而又向黑龙江省大举进

① 毕万刚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② 毕万刚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83页。

③ 毕万刚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④ 毕万刚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

犯。是时的不抵抗政策与前此虽略有不同，即怵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等“采取正当自卫办法”，但还是对国联抱有幻想，要求“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①

关东军打下齐齐哈尔后开始向辽西转进时，蒋、张的不抵抗政策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对张学良来说，辽西锦州是他在东北继续发挥某种政治军事影响的中枢，锦州一旦失守无异于全部被排除东北；而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辽西走廊和锦州沦陷，则关内中原都将失去屏障。可是，无论蒋或张均无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准备，更谈不上决一雌雄。1931年11月25日施肇基代表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锦州中立化计划，试图用和平手段保住锦州，即如“日军坚持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内进兵，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②问题是英法等不能也无法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实力防卫”了。至于张学良，他不但非常赞同锦州中立化计划，而且主张中日直接谈判，并已经同日本驻华代办矢野直接谈判。然而，日方得寸进尺，并兼中国民众强烈反对，此议作罢。可是，中国提出锦州中立化计划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中国撤回建议后，1931年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即批准了关东军以“讨匪”为名的进攻锦州计划。面对日军的锦州攻势，国民政府的“实力防卫”方针已定，但是张学良却踌躇起来。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又明令张学良固守锦州。当时已经大军压境：北路关东军已攻陷法库“以窥彰武”；南路已由营口进

① 1931年11月6日张学良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等通电。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15页。

② 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攻田庄台；中路沿北宁路干线虽未前进，但在新民已集结一师团兵力可随时出动。值此时刻，张学良却向国民政府摊了牌。12月26日他致电南京称：“奉有（25日）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饷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最后张学良表示“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盼。”^①显然南京方面无法“确切指示”。因为前此一天，张学良已以长篇电文呈请国民政府火速拨给巨额军火钱款，和调遣大部援军。张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1932年1月2日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之时，拥有三万之众的东北军悄悄地撤离了。张学良仍未改初衷，没有全国的合力抗日，单凭东北军他是不肯做此一拼的。

“一二八”上海事变

蒋介石、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把诉诸国联作为遏制日本侵略、迫使日本撤军的唯一手段。这种政策不但在暴敌面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且由于国联的无能表现，使侵略者反而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① 1932年12月26日张学良呈国民政府电。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
• 1 • 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64~565页。

1931年9月22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亦称国联行政院）正式提出关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抗议书后，国联先后于9月13至30日，10月13至24日，11月16日至12月10日，三次开会讨论。国联的反应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对日军的侵略作战不无影响，特别在大兴战斗之前，关东军的行动之所以一再受到中央军部的约束，都与国际反应有关。但是，由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态度日趋软化，日本侵略者也就愈益放纵地推进其侵略计划。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做出决议，要求日军迅速撤回铁路沿线地区以内。而10月20日国联通过的新决议，在第一条中却又首先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保护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的措施，然后才谈及日军陆续撤退问题。国联此时所强调的是所谓“非战条约”，让中日双方和平解决所谓“争端”，对于侵略和被侵略这一根本事实与问题却置之不顾。及至11月16日国联第三次开会时，日本代表明显地感到，“对日本的气氛明显缓和下来”。“在十月十三日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尚发表不利日本演说的议长白里安，到十一月十六日在会议上却不再使用非难日本的辞句了”。^①同时，由于11月下旬中国向国联提出了锦州中立化的建议，更使日本侵略者摸清中国方面无意也无力抵抗的老底。12月10日国联通过的决议，虽然重申了9月30日决议所要求的日军撤退的意旨，但对日益扩大与恶化的事态，只是一般地要求避免战争等进攻行为。此外，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委员会赴现地调查。对此，日本发表了所谓保留“讨匪权”的声明。进攻锦州就在所谓“讨匪”名义下进行的，同样北夺哈尔滨时也是以汉奸于琛瀚的所谓“剿匪”军打头阵的，只是因为于伪军为抗日军所击溃，第二师团才又赤膊

^① 田中清，《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的满洲视察》，满铁“极密”手稿。

上阵直接进攻哈尔滨。

日本侵略者乘中国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之机，不仅快速武装占领东北，而且把战火烧到华中地区，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其目的，一是把世界视听引离东北，以利于加快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二是将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上海沦为扩大侵华的桥头堡。

“九一八”事变后，早已渗透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各种侵略势力蠢蠢欲动，寻衅肇事，挑起种种争端，因而更加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可是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却成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的借口。日本侵略者甚至还不惜阴谋制造所谓“排日”事件，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32年1月10日，锦州陷落只一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便致电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让他在上海挑起事端，将各国注意力吸引过去，以便关东军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把伪满洲国制造出来。板垣还寄去谋略费两万元。1932年1月18日午后4时，5名上海莲宗妙法寺和尚，从公共租界东部的东华纺织厂向寺院行进中，行至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时，被该厂几十名职工殴打，其中一名事后因伤重死亡。事件发生后，一个名为“支那义勇军团”的组织，在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下，聚众30人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袭击，将一家拥有上千职工的工厂付之一炬，职工亦有伤亡。事态骤然严峻起来，世界注意力也果然转移到了上海。而这一切都是田中隆吉一手导演，刚由日抵沪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也与谋其间。他们既怂恿了三友的职工，又收买了焚厂肇事的日本人匪徒。①

① 1965年1月6日在东京广播电台12频道的“我的昭和史”节目中，田中隆吉供述了这一事实。《田中隆吉著作集》中亦有记载。

事件发生后，1月19日上海市政府俞秘书长往访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遗憾，并准备逮捕和惩办肇事者。23、24两日确也逮捕了三友的4名职工。^①可是，受日本侵略势力煽动的日侨仍继续闹事。20日下午在游行中日侨竟与公共租界巡捕发生冲突，并有伤亡。趁此气氛，21日晨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包含四项要求的公函：一、市长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医疗、慰恤费；四、取消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吴市长答称：取缔“排日”活动可以尽力，解散抗日团体力所不及。

在中国的万里长江上，当时有一支由盐泽幸一少将指挥的日本海军一第一外遣队。驻沪总领事向吴铁城提出如上要求的同一天，盐泽也发表声明称，如上海市长在日本僧侣事件上不能满足总领事的的要求，将决心采取行动。盐泽发表声明并非他个人的意思，也不是单纯的讹诈。由于日本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眼红的日本海军正愁着寻觅不到采取侵华步骤的借口。因此，盐泽发表声明的第三天起，即有大批海军舰只驶向上海，包括第十五驱逐队、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第一水雷战队等。侵入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也从900人增加到1800余人。日本海军不甘示弱，欲与日本陆军比翼齐飞，大干一场了。1932年1月28日，本来吴铁城市长已就莲宗僧侣事件向日本总领事表示，完全接受21日所提出的条件，亦即在限期前做了正式答复，可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当天晚上竟采取了行动。

上海的主要市区是租界，住有不足10万人的外侨和300万中国人，但租界是中国政府不得行使主权的外侨居住区。它又分为

^①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55页。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部分。前者是各国公共侨居区，实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法租界是法国专管居留地。租界设有市参事会，维持治安和从事行政工作，有特设的工部局。租界之外系中国政府管辖区。但工部局越出租界，在邻近地区筑路，此种地区被称为“越界筑路”，工部局企图在这里行使政权，中国不允，故系有争议地区。公共租界的防务由各国分区负责。日本防卫区以往一直是虹口租界区。1932年1月18日，在中日关系突趋紧张形势下，公共租界当局在防备委员会上修改了过去的区划。日本防区从北部越界筑路——四川北路，扩大到四川北路以西600多米，即闸北地区。租界当局主张对这一地区拥有防卫权，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中国在那里驻有军队。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入四川北路以西，袭击那里的中国驻军，制造了上海事变。

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鼻子底下来了，国民政府再也不能像对待东北那样推行不抵抗政策了。当时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是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统率的一支铁军，辖有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等3个师，共30000余人。战斗在闸北一带打响后，29日从“能登吕号”起飞的飞机轰炸了上海北站、商务印书馆等处，给中国造成很大战灾。然而，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完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四个小时攻下上海”的狂言。日本海军接连增派陆战队，2月2日还新编了“出云号”为旗舰的第三舰队，统一指挥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当天即向闸北发起总攻，翌日又攻打吴淞和高桥两个炮台。海军进行陆战本来就有它的局限性，又遇到第十九路军这支劲旅，不得不求助于日本陆军。实际上，日本陆军大臣于2月2日即发出出兵上海的第一号动员令，派金泽第九师团参加对上海的进攻。编入第九师团的还有其他师团的特种兵。2月15、16日第九师团登陆完毕，植田师团长立即要

求中国军队撤退。但第十九路军于2月19日答称：“来函所开各节……本军长未便答复。”^①遭到拒绝的第九师团，从2月20日晨起，以江湾为主攻方向发动进攻。但因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至第三天亦无进展。于是，2月23日日本内阁又决定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并成立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1932年3月1日，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和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即与第九师团相呼应向从庙巷镇到江湾镇西侧的中国军阵地展开全线进攻。3月6日，第十四师团也开始在吴淞陆续登陆。此时中国军队已呈退却之势。

面对中国空前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西方列强同东方的日本侵略者持同样态度。显然前者欲假后者之手把第十九路军逐出他们妄图行使行政权的“越界筑路”地区。但是日本愈演愈烈的疯狂武装侵略，也侵害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早在1932年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即曾警告日本：不得将公共租界作为作战的根据地，提出停战的建议。继美国之后，英军指挥提出第二次停战建议，但为日军所拒绝。第三次停战建议是2月2日英、美、法驻日大使联合向日本外相芳泽提出的，亦为日本所拒绝。不过，在日军进攻上海的同时，松冈洋右受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的委托，以特使身分从2月18日起一直逗留在上海，其任务自然是外交方面的。因为，1932年1月29日中国政府即将日军发动上海事变一事诉诸国联；30日国联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2月16日国联理事会主席本格尔要求日本自重；2月19日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要求，决定将中日“纠纷”移交国联大会讨论，时间为3月3日。2月末，日军在第十九路军坚决抗击下痛感兵力不

^① 1931年2月19日蔡廷锴致植田谦吉函。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还发表了《对外宣言》，表示，将“奋斗到底”。

足，虽又得到两个师团的增援，但前景不容乐观。而中国方面，为了“保全上海经济中心”，根本不愿打仗，自始即准备对日“采取和缓态度”，“万不能发生冲突”。^①因此，1932年2月28日，在英舰“肯特号”上实现了中日会谈。3月4日和11日国联还先后通过决议，要求中日进行停战谈判，并由在上海租界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派代表参加。但因日本方面在撤兵区域、撤兵期限等问题上坚持无理要求，致使谈判旷日持久。直至5月初才达成协议。其间，由于日方在撤军日期上坚持无理要求，至4月10日谈判已无法进行。停战问题遂被移交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解决。4月15日日本政府又训令其驻日内瓦代表不出席十九国委员会，各国代表极为愤慨，坚持主张限期日本从上海撤军。4月30日，十九国委员会做出决议，授权上海共同委员会规定日军撤兵和恢复正常的日期。1932年5月5日签订的《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②

日本侵略者动用大量海军和3个师团的陆军，制造一场上海事变，虽然没有捞到什么，但是关东军却在此期间夺取了哈尔滨，并拼凑起了伪满傀儡政权，从而也算是部分地达到了侵略目的。

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如前所述，国联理事会第三次开会讨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问题时，于1931年12月10日做出最后决议，除重申9月30日决议，

① 1932年1月23日孙科给吴铁城的回电。电稿上批有“经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字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531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884～885页。

要求日军撤回铁路沿线地区外，还决定派遣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到我国东北“就地研究”，中日两国各派一人“襄助该委员会”。此即一般所说的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并无职权。国联给调查团划定的活动范围是：

“如双方开始任何商议，该项商议不在该委员会职务范围之内；又该委员会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①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看出调查的局限性，故在表示执行决议的同时，发表包括八项内容的保留声明。其中第2项声称，“现经决议案及行政院主席宣言所证实之办法，中国认为系一种实际上之办法，包括四项互相关连之要点如下：（甲）立即停止战争；（乙）日本占领东省在最短期内终了；（丙）中立人员对于今后一切发展之视察及报告；（丁）行政院所派遣之委员会对东省全局作实地详核之调查。”^② 施肇基还强调，此四项缺一不可。而日本代表却利用当天国联通过的决议第二条规定^③，声明保留所谓“讨匪权”，为继续扩大武装侵略寻找借口。对此，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于国联通过决议的翌日即12月11日发表声明，驳斥日本的无理主张，指出：“东省现有之无法纪状态，实为特殊之情形所造成”“东省受日军之侵略，使人民之生活失其常轨”，“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军队侵略并占领其领土，更不能容许此项军队攫得中国当局之警察权。”声明还表示，国联决议要求日军撤至铁路区域之内，不等于日军在铁路区域内驻屯合法，此项驻兵权中

①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报告，193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38页。

②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报告，193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39页。

③ 该条规定：“行政院认为自十一月二十四日会议后事态更为严重，知悉双方担任采取必要办法防止局势之再行扩大，并避免任何行动，致再令发生战事及丧失生命之事。”

国从未承认：“日军侵占东省各地后以利诱威胁从事所谓新政权之组织”，中国不能承认。^①

日本方面已预先得知，国联调查团将无所作为或作为有限。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前私下向日本政府打了招呼：调查团只是研究关于搅乱中日和平原因的一切问题，绝不批判、干预日本的军事行动。所以，日本政府对于国联调查团的活动，没有采取拒绝和破坏的态度，但也不能不严加戒备。同时对其加快侵略步伐也不无影响。

1931年12月21日调查团组成，为首者是曾任殖民总督的英人李顿，故一般称其为李顿调查团。^②1932年2月13日调查团从美国旧金山乘船赴日，2月29日抵达东京后，在为期七天的逗留中，五次会见芳泽外交大臣，但关键性的折冲是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进行的。日本内阁有关各省商定的方针，是由陆军大臣直率告以“帝国对中国问题的真意，特别要暗示，关于满蒙问题帝国的决心已定。”^③为避免会谈时有所疏漏，日本政府还特别炮制了由八项构成的《陆军大臣与调查委员的对话要纲》。^④这是一份难得的侵略者赤裸裸的自供状。例如“要纲”第三条公然声称，由于日本每年有100万人左右的人口增长，所以“帝国的海外发展”不但是“远东而且也是保持世界和平”所绝对必要的，而且“帝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对象”求诸满蒙，是“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必

①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报告，193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40页。

② 除李顿爵士外，还有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法国劳克特将军，美国麦考益少将，德国潘尼博士。

③ 田中清：《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的满蒙视察》，满铁“极秘”手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53页。

④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53～456页。

然现象：“如果人为地阻止这种绝对的必然现象，只能造成政局的混乱，导致民族关系的灾祸，此外无任何益处。”荒木还表示，即使日本变成焦土，也将不顾利害而力争。由此可见，此后不久由外相内田康哉所推行的所谓“焦土外交”原来是拾自军部。

调查团摸了日本的“底”之后，3月14日抵上海。中国国民政府派原外交部长顾维钧、上海市长吴铁城、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接待调查团。对国联抱有幻想的国民政府自然要竭尽全力说明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将数十种说明中日关系的“说帖”提交给调查团，尽管对调查团的职权与作用持有保留。当时上海仍在事变气氛之中，调查团很快离沪去各地。在北平曾一连三次面见张学良。在平的东北主要军政首脑都获得会见调查团的机会。

1932年4月23日，调查团到达东北的沈阳，步入关键性调查阶段。调查团经过在中日两国的广泛接触，至少对事实本身已有相当了解。因此，日本对待国联调查团的策略，不在于谋求改变调查团的想法，而是直接间接让调查团得知日本的真意。调查团到达前，关东军纠集关东厅、满铁、领事馆等共同炮制的“接待方针”特别强调要使调查团对日本在东北的“地位与现状”有“根本性的理解”，说明时不限于“事变有关事项”，应“从历史、地理、经济、民族等各方面”影响调查员的认识；“其他事项在满洲对调查团一行不做介绍。”可见，东京和现地的接待方针是一致的。现地人员还被规定，必须恪守“自己的立场，特别是作为派出机关的资格，说明问题时要有限度。”^①

① 田中清：《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的满洲视察》，满铁“极秘”手稿，第100页。

调查团在东北一直活动到1932年6月4日，耗时整6周。日本侵略者对调查团采取了严格的“警务措施”，除对调查团本身进行“不露骨”的“监视、干涉”外，关东厅系统警察和关东宪兵队把主要力量放在封锁调查团，切断调查团同中国人民的联系上。马占山是一度屈从日伪但很快又重举抗日义旗的著名抗日风云人物。1932年4月12和17日两次致函在北平的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调查团到达北满后，他又先后派参议姜松年和王子馨分别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要求调查团赴海伦与其会见。王到齐后被日特发觉，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也被搜去，而王本人竟被装入麻袋从楼上掷下活活摔死。姜在哈虽“幸达使命”得以会见调查团，但会见后是从美国领事馆的地窖后门转到一家杂货店才得以离开的。马占山亲自会见调查团的愿望终未实现。调查团不得已于1932年6月1日密派美国、瑞士两名记者冒着危险绕过火线，才得以同马会面一次。总之，中国人是难以接近调查团的，以致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中都不得不十分遗憾地谈及此点：“调查团并曾接到书信一千五百余件，其中有亲手交来者，但大多数系由邮局辗转递到。”可是许多采取巧妙办法向调查团送信的人，在日伪警宪后来制造的所谓“投书事件”中，都被捕入狱。

然而，调查团不是代表被侵略者的利益的。他们离开我国东北再赴东京，与日本当权者重新讨价，然后于7月20日回到北平，直到1932年9月4日“报告书”才签字。“报告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审查中日间的争议（包括此次争议之原因、发展及在考查时之现状）；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的解决办法（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但不论前者或后者全都是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抹煞了侵略与被侵略的立场。正因如此，

1932年10月2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报告书”后，中国舆论哗然，全民谴责，中国驻国联代表急速发表宣言，对“报告书”表示遗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开发表的“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尖锐地指出：“报告书”“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计划”，“无耻地主张满洲应作为自治国”。通电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奋起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与独立。

以“中国近代发展之述要”为题的“报告书”第一章，是帝国主义歪曲中国历史、污蔑中国人民的典型。它不但诋毁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而且诬称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一切“威胁世界之和平，以构成世界经济不景气之一原因。”而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报告书”的炮制者与日本侵略者不但在诽谤、丑化共产主义运动上，立场完全相同，而且在攻击中国的爱国群众运动方面也一个鼻孔出气。日本侵略者正是借口中国的“排日”而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事变。可是，“九一八”事变的战祸尚在蔓延，上海停战协定甫将签字，“报告书”即替日本侵略者开脱，抱怨中国“经济抵制及将排外宣传导入学校两事进行太猛，遂以造成本案发生时之特殊空气”。“报告书”的炮制者不但抹煞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且完全混淆了中国政局的原则是非。举世公认，以列强瓜分中国为背景的军阀割据与战争，是近现代中国政局混乱的根源，可是“报告书”却说中国的“扰乱”“由共党战争所产生”。他们这样做是意欲掩盖日本的侵略目的。

然而，西方列强向来是反对日本独霸“满蒙”的。所以，“报告书”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能不有所非议。“报告书”说“日方系

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而“中国方面依照其所奉训令，并无进攻日军，亦并无在特定时间及地点，危害日侨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于日本军队，并未做一致进行或曾经许可之攻击。”对于柳条湖铁路，“报告书”亦表示“即就铁路损害之本身而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动之正当。”调查团对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基本上亦持否定态度。说伪满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并指出“该政府其各部名义上之领袖虽系住居满洲之中国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权，则仍操诸日本官吏及日本顾问之手。”

“报告书”的这番话，并非是替被侵略的中国人说的。它是为了引出他们所开的解决“满蒙”问题的“药方”——瓜分。

“报告书”明确主张：中国东北既不能恢复到事变前的“旧状”，同时“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在政体，亦属同样不适当。”“报告书”为推销其以“自治”为名的列强瓜分计划，公然强调：“中日两国以外，世界其余列强对中日争议均有重大利益。”还说

“倘仅促进相邻二国间之和平，而忽略第三邻国之利益，则非特不公，亦且不智，更非和平之所要求。”具体办法如何呢？“报告书”设计了一种“特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国中央政府只管“一般的条约及外交关系”，“海关、邮政、盐务所之权，或于可能范围内，有管辖印花税及烟酒税行政之权”，“任命东三省政府行政长官”。此外的一切权力均属于他们拟议的东三省“自治政府”。这个“自治政府”有4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而这正是“报告书”要害之所在：

第一、“东三省自治政府”“由外国教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兵”，“其他一切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所谓“其他一切武装实力”，“包括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别

警队或铁路守备队。”

第二、“自治政府”“指派相当数额的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民应占一重要之比例”。

第三、“自治政府”按国联理事会所提名单，“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警察及税收机关。该二员在新政体草创及试行期内，当掌有广泛权限。”

第四、“自治政府”按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

关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报告书”建议通过签订“中日条约”，使“日本自由参加东北经济上之开发”；“维持”在“热河省现在享有之权利”；关于居住及租地权可“推及于东省全境”；铁路方面签订“铁路使用之协定”。

由此可见，西方列强的如意算盘是：政治上以“高度自治”为名，使我国东北沦为列强都可插足的殖民地；经济上则迎合日本的欲望，使之得到优惠。然而，这个“药方”是不灵的，不仅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而且已经肥肉进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不能接受的。

“焦土外交”与承认伪满

拼凑伪满政权虽然抢在调查团来临之前完成，但是日本承认伪满政权却迟迟未见行动。这固然与国联调查活动有关，但不是唯一原因。

溥仪出任执政后，1932年3月12日伪满洲国以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名义向17个国家发出“对外通告”，要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然而，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日本本身除3月19日通过其

驻长领事答称业已收到“通告”并对“新国家的前途”表示欢迎外，也未敢贸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心里明白，拼凑伪满洲国的傀儡戏虽然收场了，但是“其权力并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而且各地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在日本军的援助下才得以平定的”，“因此，很难认为满洲国已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①特别是1932年4月初马占山突然离开伪满政权毅然走上抗日道路后，伪满的局面更加狼狈不堪。这不只是因为马占山重举抗日义旗，促进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高涨，而且马占山也以自己亲身体验揭露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1932年4月12日，马占山在其“通电”中严正指出：伪满洲国的机构全部处于日本军的强制控制之下，伪满国家官吏和省政府官吏将任用相当比例的日本人，特别是各省总务厅长和警务厅长都任用日本人；关东军司令官曾称，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不能放弃东三省，如第三国干涉将与之宣战，没收军阀土地，大量收买民有地，把未垦荒地变为“国”有，以供日本移民之用，等等。紧接着，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进行现地调查，色厉内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自感理亏。又何况，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东北最大财源——关税，正处心积虑强制接收实权操在欧美人手中的东北各海关，结果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日本相当被动。所以，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急先锋和制造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们如何急于使伪满洲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怪胎和毒瘤得到国际承认，但是长期周旋于国际斗争的日本外务官僚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伺机而动。1932年6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满洲国承认问题”的照会，指出日本如承认伪满洲国

^① 满铁经调会第五部，《承认新国家问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打字稿。

是违反“九国条约”的。6月27日法国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1932年7月6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转任日本外务大臣后，他从其坚决支持关东军占领东北和拼凑伪满洲国的立场出发，加快了承认伪满洲国的步伐。7月12日，日本内阁便就承认满洲国问题做出决议：该决议实际也是日本政府对付国联调查团的方针。其大意是：如国联中国委员会询问满洲国承认问题，可应付说帝国虽有意尽快承认但时间难以明言，如对方进而质问在调查团提出最后报告前或离开亚洲前是否不承认时，可回答承认一事系帝国自身决定的问题，与上述事实并无关系，不受约束。^①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僚们对日本承认伪满，意见并不一致。加以6月下旬至7月上旬因日本动用军警夺取以大连为首的东北各海关，驱逐外国海关监督，已引起国际的普遍强烈不满，如再擅自承认伪满，日本势必更为孤立。可是，日本政府既然全面追随军部，与军部沆瀣一气，它就必然像军部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那样不可逆转，只能陷入国际孤立主义的绝境。1932年7月18日，日本政府为统一对外口径召开了地方长官会议。内田准备的经内阁批准的讲话稿中声称“帝国认为有必要承认满洲国，这已是既定方针。”但内田在讲话稿中也流露出孤立主义外交的悲哀。^②当时，国联调查团已完成现地调查，又回到日本与日本军政要人会谈。1932年7月7日，调查团分别会见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和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后者刚任职一天，但他却断然拒绝了调查团所转达的中国国民政府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一）承认东北自治，中国保有宗主权；

① 1932年7月12日日本内阁决定。《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584页。

② 1932年7月16日内田康哉讲话稿。《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587～588页。

(二) 承认日本在满权益；(三) 日军从东北撤退，废除军政，实行文官制度。7月9日调查团会见陆军大臣后，又数次会见内田康哉。日本政府特别是内田的态度，正合军部的心意，同时也符合急欲掠夺剥削“满蒙”的日本财阀的希望。1932年7月20日，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男爵乡诚之助向内田提出一份“关于承认满洲国的建议”，把承认伪满说成是“产业开发”，“振兴经济”，“促进日满通商贸易”，“发展其他各种经济关系”的“当务之急”。日本政府确也将此事作为当务之急。1932年7月26日报端即传出消息，日本政府已决定向伪满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得悉此消息的中国国民政府命驻日公使蒋作宾访问内田询问究竟。内田不仅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知蒋作宾，日本政府关于“东省问题”的方针已定，不容修改。其后中国公使虽又照会日本，说日本派遣全权大使承认伪满，是国际条约所绝对不允许的。可是，一纸外交空文在癫狂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究竟有何用处，不言而喻。1932年8月8日随着日本军部的人事大变动，决定日本军部三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武藤信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日本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从而实现了日本驻满侵略机构的“三位一体”制。8月20日武藤赴东北就任后，立即筹备与伪满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通过该“议定书”的签订“不仅要明确表示帝国承认新国家之意图，而且必须确定帝国要求之各项条件。”^①正当此时，日本驻巴黎国联事务局长泽田来电称，日本不与其他国家交涉而单独承认满洲国，应慎重考虑利害得失。身居西欧的泽田洞悉国际风云动向，他的建议无非是试图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寻求一条既可维护日本侵略权益，又能缓解国际紧张关系的出

^① 满铁经济会第五部：《承认新国家问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打字稿。

路。泽田的方案是：中国保有对满洲领域的固有主权，但在该领域的主权行使为满洲国专属。可是，内田告诉泽田：武藤到任即与伪满交涉缔约问题，然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8月25日他本人将发表施政演说，以此次演说为“线”，以后将彻底贯彻日本的强硬立场。内田于22日回电，25日他果然在国会上发表了在日本历史上总要提及的演说，他叫嚣：即使日本变成焦土也要承认伪满洲国。所以，内田此时所推行的外交，被称为“焦土外交”而载入史册。

内田的演说，不单是宣言，也是行动，而且时间表十分紧迫。因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已于1932年9月1日在北平修改完毕，日本决心抢在报告书提出前承认伪满洲国。于是，东京和“新京”双方都在加紧。9月6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承认伪满的决议，并由斋藤首相入宫奏请日皇裁可。9月8日内田康哉会见元老西园寺公望，请求同意承认伪满。9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承认伪满的声明。值此之际，中国国民政府再也无法坐视，但也只是于9月11日由驻日公使蒋作宾会见内田，请其注意而已，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力措施。9月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伪满洲国的法案。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以驻满全权大使的身分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全文如下：

“一、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

二、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事实上同时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

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①

此为公开文件，还有一系列秘密附件，由“满洲国政府确认有效”，它们是：1932年3月10日本庄繁与溥仪的秘密换文；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的管理和线路修筑、管理协约》和基于该协约的附属协定；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的《关于设立航空会社的协定》；1932年9月9日武藤信义与郑孝胥签订的《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这四个附件，显然是属于“议定书”第一款的内容。“议会书”第二款，是关于日本在伪满无限期驻兵的规定，其目的是使伪满洲国永远保持着关东军的军事占领状态。

“议定书”签订的翌日，1932年9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宣言”，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抗议书”。日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宣言”中声称“对满蒙并无领土野心”，但要“确保”“在满之权益”。而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抗议书”则只是姿态。说“今当调查团工作甫竣，国际联合会尚未加以讨论之际，日本遽行承认伪组织。此项举动，一面适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无异对国际联合会之权威，为侮辱性之挑战。”还指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所推行的“暴力残杀与征服的政策”，是“近代国际关系之历史上，罕与伦比”的。^②

日本在侵略我国东北问题上一意孤行，最后只有采取国际孤立主义政策，于1933年2月退出国联，与国际社会分道扬镳。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215页。

^② 1932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承认“满洲国”致日本抗议书。